

古典文學的内部研究

刘宁 李鹏飞◎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葛晓音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古典文學的内部研究

刘宁 李鹏飞◎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文学的内部研究 / 刘宁, 李鹏飞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200-12299-2

I. ①古…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古
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0715 号

古典文学的内部研究

GUDIAN WENXUE DE NEIBU YANJIU

刘 宁 李鹏飞 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30.5 印张 480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2299-2

定价: 9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文学研究要立足文本，对外因的分析，要以内因为出发点。当然，立足文本中的“文本”，不能太狭义地看，不是单指文学文本，史料也是文本。即使文本就是指文学作品本身，那它也包含义理和辞章两个方面。……

学术研究格局要大、器局要宽，格局和学术范围的大小，学术眼光的高低，使用方法的单一还是多样，这三者是有关系的。

——葛晓音教授



2009 年葛晓音教授在研究室



1983 年和陈贻焮先生在北京大学镜春园 82 号



2012年在“古典文学内部研究之反思”学术研讨会上
左起：简汉乾、唐梓彬、康建强、徐盛、刘占召、梁海燕、陈先明、郭朝凤、
臧清、吴相洲、葛晓音、吴光兴、姜必任、金昌庆、刘畅、张耕、刘宁、
绀也达野、陈桥生、李鹏飞、李俊、陈伟强、李伟



2004年在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
左起：葛晓音、户仓英美、张明非



2006年和学生在北京郊区
后排左起：张耕、吴相洲、钱志熙、葛晓音、李鹏飞、李俊、杜晓勤
前排左起：郭朝凤、臧清、刘宁

封面集王羲之字

责任编辑 王忠波

装帧设计 伦洋工作室

目 录

德性之维，鉴照之境

- 论学术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本质与方法 钱志熙 (1)
- 韩白关系考 朱 琦 (19)
- 礼乐文儒思路在盛唐落幕后的终结 臧 清 (33)
- 从王勃《春思赋》看初唐诗赋互动的文体创新 陈伟强 (50)
- 《河岳英灵集》的地域性、派别性问题
- 兼及“开元十五年”新解 吴光兴 (65)
- 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 孙明君 (74)
- 文学是艺术化的言说 吴相洲 (88)
- 大同句律形成过程及与五言诗单句韵律结构变化之关系 杜晓勤 (98)
- 晚唐咏史诗的兴盛之一：以史官观念的转变为中心 金昌庆 (130)
- 初唐文学士族迁徙与文学风貌关系的考察 赵志强 (146)
- “师其人”与“明其理”：韩柳古文取法前代艺术的方式 刘 宁 (155)
- 谢灵运的南徙及其影响 陈桥生 (173)
- 齐梁诗会文化和诗风 姜必任 (190)
- 齐梁咏物诗审美情趣的渊源和表现艺术的发展 徐 盛 (205)
- 试论古诗的诗意跳跃性与连续性 李鹏飞 (222)
- 论卢照邻诗文中的“时”“才”“命” 郭朝凤 (234)
- 盛世中的穷者之音
- 论《箠中集》诗人的复古与涩调 邓 芳 (248)
- 杜甫和他的兄弟们 李 俊 (263)

唐宋“古文运动”概念及其相关问题	冯志弘 (282)
张九龄文学思想初探	陈先明 (298)
曹魏缪袭作鼓吹曲辞新论	梁海燕 (306)
“以古为律”与杜甫七律艺术的革新	刘占召 (324)
浅探宋代士人通儒文化人格与印刷术发展之关系	康建强 (340)
谢朓作品中的隐逸思想	简汉乾 (348)
孙公赋与中国山水美感话语之开启	吉 凌 (360)
“文笔说”之“笔”义辨	唐梓彬 (381)
论中唐乐府中的风俗题材的兴起	吕家慧 (400)
让“文学史”还原“审美”的面貌	李 伟 (414)
论鲍照五言诗的写景与抒情方式的新变	毛若苓 (430)

附录

探索古典文学的内在之理

——葛晓音教授访谈录	刘 宁 (443)
------------------	-----------

追寻那一切的开始之开始

——葛晓音教授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及其方法	李鹏飞 (461)
----------------------------	-----------

作者单位	(481)
------------	-------

编后记	(483)
-----------	-------

德性之维，鉴照之境

——论学术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本质与方法

钱志熙

学术研究的最终指向，可以概括为二：一为事实的发现，一为理论的创造。事实的发现似乎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简单的事实，往往含有明确的时间、空间、数据、对象等因素的事实，具有非此即彼的明确的判断标准。对于此类简单的事实，文献考据的方法是有效的。另一类则为复杂的事实，即一种包括综合因素的事实，需要通过我们的认识来重建研究对象的性质与状态等。就古典文学来讲，如孔子有无删诗，陶渊明得年之多少，李白入长安的次数等，都属于简单事实，而诸如建安风骨、玄言诗风、盛唐诗风等，则属于复杂的事实。简单事实的获得，表面上看似乎不须与理论发生关系，但从促使发现者从事研究的某种学术观念来看，仍然是受着理论的支配的。如近代史学即史料学的观念，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许多考证性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样，小说、戏曲的考证之所以在近百年来蔚为风气，几成显学，与近代文学观念的变迁、小说戏曲由传统的娱乐文艺上升为文学史的正宗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简单事实还是复杂事实，当它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时，都已包含了学者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离开了思想的、纯粹的客观性学术是不存在的。所以，虽然在习惯的判断中我们可以将学术研究的最终指向区分为事实的发现与理论的创造两类，但实际上它们是难以完全划分开来的。复杂事实的呈现离不开理论，并且理论就是从复杂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古典文学领域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重文献与重理论之分歧，虽然未至剑拔弩张，但不能否认，这种困扰是一直存在的。推至古代的场所，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虽然在透彻之悟里曾经融为一贯，但在实际的学风、学派分歧中，

往往被截为两端，极端时至水火不容，其结果则是各自流于弊端。清代章学诚对此曾有论述：“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鹜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①学术之流弊，常是世道人情之流弊所致。对此，学者除了反思自身的学术良知外，似无别法。但是除此之外，也有认识上的偏差问题。这种场合，章学诚所说的思所以然，还是极其必要的。笔者多年思考学术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本质，常常觉得零乱不能归纳。近来，笔者稍窥南宋以来各派学术，对理学、心学、考据学各派做了一些思考，尝试使用传统学术的范畴来阐述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本质及其方法，即以德性之维为学术研究的终极性的价值判断依据，而以鉴照之境为理论创造的基本方法。

—

多年来，人们对理论一直有一种误解，一谈到理论，就会联想到教条与空谈，以及主观随意。这也不奇怪，因为在我们过去与现在的许多所谓理论文章中，的确有不少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仍在不断地炮制一些空洞的观念与教条。这些所谓的理论，因为其中没有真正的事实内涵，而流于务虚学者的概念游戏，或者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玩弄民意的把戏。学术研究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往往以十分主观的、捕风捉影的方式设计某些课题。其做法是主题先行，先有框架，后截割事实填充其间。这些框架并非研究者经过长期研究，从历史事实上概括、提炼出来的，而是运用某种现成的理论或者简单地搬用前人的方法与框架。但是，理论难道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吗？真正的理论，是体现了我们人类思维可贵的本性，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也是我们理解一切事物，支配一切行为与行动所唯一能够依赖的理性之维。道不可须臾离，没有人不是在思想的支配下行动的，不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页。

同之处在于对这种理性之维是自觉地去体认，还是并没有自觉地体认到它，或者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虽然道不可须臾离，但自觉地追求悟道，进行艰苦的本体反省与理论思维，仍然只能是部分个体的出众表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的事业、理论创造的事业。中国古人曾经前仆后继、坚持不懈地走在这个悟道、尊德性的道路上，尤其是从宋到明的数百年内，一种求道、求圣学的热情，使得许多人都卷进去了，讲学风气兴盛，有关理学、心学的著述也不断涌现，其间创造出许多思想的精品，其对人性、人类本质之思考之深入，一点也不逊于德国的古典哲学。一直到乾嘉学术的时代，虽然人们的努力方向已经明显地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但是没有一位乾嘉学术大师坦言放弃尊德性。相反，一部分人虽然放弃了宋明理学的专尚德性的治学方法，但仍然以他们的方式追求德性之维，他们承认经学考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究明儒道；其中不少同时做着考据与义理的工作，戴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正是以乾嘉训诂的方法来做宋儒留下来的工作，并且这其中明显看出有南宋陈淳《北溪字义》的深刻影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戴震是典型的希望两个轮子推车。他的学术之所以较同时的考据家高出一头，也正因为此。还有乾嘉考据之学的代表性人物凌廷堪，厌弃空疏之学，希望由礼学的考证返归性情之原，“精于三《礼》，专治十七篇，著《礼经释例》一书，上绍康成，下接公彦。而《复礼》三篇，则由礼而推之德性，辟蹈空之弊，探天命之原，岂非一代之礼宗乎？释礼之暇，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合情饰貌，相须为用者。乃辨六律五音，明四旦七调，著《燕乐考原》，绝无师承，解由妙悟，容积周径之说，《河图》《洛书》之谬，皆可废矣！”^① 他的考证礼乐，是为了“由礼而推之德性”。由此可见，乾嘉学术并没有简单地放弃理论思考，而是由道问学而最终解决尊德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乾嘉考据主要是以经学考据为主，正是建立在阐述儒道的价值判断之上的。但是，也的确有不少人最后舍本逐末，真正陷于支离事业，做了不少失去意义的学问。正如辞章的过于雕琢会“可怜无补费精神”，体悟之偏执脱离生活实际会鼓动狂禅之气，义理之失去主体印证会走向教条，考据之末流也会产生完全失去德性的学问，导致博学而无知的人格出现。学问与现实生活的事务，都

^① 江藩《校礼堂文集序》，载于凌廷堪著《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首第3页。

需要有德性与义理支撑，这个道理，连《红楼梦》里面的几个小女子都懂得。探春和宝钗兴利除弊，想办法为大观园的财政开源节流，其间说到朱子《不自弃》文，探春还杜撰《姬子》，讨论到义利之际的事情。“李纨说：‘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你们且对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①她们能说这话也不奇怪，因为曹雪芹就深谙性命之学，透彻理性之维。

要透彻理解学术中的实证精神与思辨哲学的关系，还是应该采用中国传统哲学中“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一对范畴来把握。《礼记·中庸》：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②

朱熹一派的理学，将尊德性与道问学视为两事，企图让学者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状态；陆九渊则从“心即理也”的心学本体观出发，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根本上是一件事。陆九渊《语录》中记载了双方争论的要点：

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多了些子？故游某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其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③

① 曹雪芹著，蔡义江校注《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44页。

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3页。

③ 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0页。

在陆九渊看来，一切真正的问学（或称学问），都在德性之中；不知尊德性，无所谓真正的道问学。后来王阳明进一步阐发陆九渊的旨意，也是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实为一事：

以方问尊德性一条，先生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①

从思辨的彻底性来讲，陆、王心学无疑是究竟之论，而朱熹的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分为两事，在事与理之间留下一个人为的隔阂，在逻辑上终不圆满的。在陆、王看来，一切学问之事，无不体现德性之维。游离于尊德性之外的学问有没有呢？自然是有，但陆、王认为那只是支离事业，不是圣学功夫。那么，与圣学无关的各种专门的学问及艺术、技术，又怎么来体现这一关系呢？我们知道，在陆、王心学体系中，这一切也一定应该得到圆满的解释的。从心学的逻辑出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求每一个问学之士，不管其所从事的是何种学问与艺术、技术，首先都应该是一个自觉的德性圆满的人，其学问的价值的高低也只在德性之圆满与否。而一切的学问与艺事，也都是以各自的方式与人类主体的德性之维、人类自身的终极之道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具体的学术与技术、艺术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件具体的工作都直接地呈现德性之维的。现实中的各种学问与艺术、技艺中，存在着并不都与德性、与道直接相关的各自的评价的标准。这些标准显示它们往往独立于哲学之外，使得陆、王“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在学理上陷于困境，客观上也阻碍了近代实证科学的发展。清代朴学之所以脱离心学，甚至脱离一般的理学，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此。相对来说，朱熹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分为两端，虽然在思辨上不彻底，削弱了其哲学的价值，但在实践上却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为专业性、实证性的学问的发展开启了一扇大门。于是出现了南宋以黄震、王应麟

^①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等为代表的理学家流派的博学宏辞的一种学者，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清代考据经学也是由朱熹的道问学的理路发展出来的。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即揭示了这一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

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者，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

又云：

朱子求一贯穿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为勉斋、九峰，再传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①

这里正指出朱子道问学一道对宋代、清代博学考据一派的开启，今人研究章氏之余英时、山口久和等学者的著述，也多发挥此论。有学者至有“使朱子的道问学得以善终的清代考证学”^②之说，最直截地指出清代考据学与朱子道问学在学术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但是正如陆九渊、王阳明所揭示的朱子将尊德性与道问学视为两端，甚至分为两事，存在思想上内在的矛盾，容易造成于德性之维之外的徒劳的博学、辞章末流的学术流弊，这种流弊在乾嘉考据学的畸形发达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虽然章学诚对由朱子道问学而形成的“服古通经，学求其是”的宋、清诸儒给予高度评价，但对于乾嘉考据的末流表现，整体上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既批评假尊德性的空言性命，又批评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262、264页。

^② 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